

士大夫精神溯源

——东汉巾州党人研究

张保同 著



中国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士大夫精神溯源

——东汉 中州党人研究

张保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士大夫精神溯源: 东汉中州党人研究 / 张保同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8

ISBN 7-5059-5349-4

I. 中… II. 张… III. 士-研究-中国-东汉时代 IV.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4606 号

书 名	中国士大夫精神溯源——东汉中州党人研究
作 者	张保同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校对	张 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王 军
印 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5
插 页	1 页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349-4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前 言

几年前，我的老同学黄宛峰女士在南阳师范学院任职期间，以《中国士大夫精神溯源——东汉中原党人研究》为题申请到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因其工作调动，此项目的研究暂时没有启动。我对秦汉史也略通皮毛，对此课题颇感兴趣，有意将其承担下来，但担心自己才疏学浅，不能把它做好。2005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访学期间，与我的老师赵世超先生谈及此事，赵先生充分肯定这一课题的意义，并给我以鼓励。于是便与老同学协商，接任了这一课题的负责人，开始着手该课题的研究。经查阅大量原始资料，并阅读了不少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著述。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了这本不成体统的小书。但愿没有辱没这一课题！

近些年来，汉代士大夫研究是治汉史者的热点之一。在汉代，士人经历了由游士到士大夫的重大转折。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逐渐实现了与专制皇权政治的结合，上升为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通经入仕成为士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政治理想的必然选择，士大夫作为一个深刻影响政治和社会进程的阶层随之形成。但在霸道为体、王道为用的政治方针下，儒学在西汉中后期仅作为润饰政治、教化天下的工具发挥功用，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迨于东汉，光武、明、章诸帝大力提倡儒学，褒奖名节，儒学的社会化程度加深，真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与此相

应，儒生通过察举征辟制度大批进入政权，士大夫阶层迅速扩大，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形成。在东汉专制皇权政治机器的运转中，作为儒学与皇权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士大夫担当着儒家“道统”的持守者、政令决策的参与和执行者、文化的传承者、轨德立化的实践者、衰败政治的拯救者和社会正义力量的代表者等多重社会角色。

东汉自和、安以降，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益颓败。士大夫阶层从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出发，以其特有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与外戚、宦官邪恶势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在与外戚、宦官的长期斗争中，官僚士大夫作为一个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个体行为演化为政治集团间的较量。桓、灵年间，士大夫反对宦官、拯救政治的运动进入高潮。官僚士大夫政治势力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由此酿成了两次党锢之祸。党人是宦官加于士大夫集团头上的罪名，作为士大夫的政治代表，党人在桓、灵年间拯救政治、搏击宦官中表现出来的修己安人、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趋死不退的道德气节，反映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可贵性格，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精神。修己安人、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的文化性格首倡于孔子，曾子、孟子发挥之，东汉党人则把先秦儒家这一文化传统付诸整体的政治实践。孔、孟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在东汉以前只是个别士人的追求和行为，东汉则成为士大夫政治集团的集体实践。东汉党人的救世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其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却给后世士大夫以巨大的影响。

在以党人为代表的东汉士大夫集团的救世运动中，中州人士构成了党人的主体，处于核心和骨干的地位，发挥着主力军和领袖的作用。这里的中州，大致以今河南省所辖区域为准。中州党人陈蕃、李膺、范滂等人，在搏击宦官的斗争中，不畏权宦、舍生取义、威武不屈的壮举，一方面体现了士人的政治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意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被奉为士人楷模。陈蕃“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的壮语，李膺“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范滂的“澄清天下之志”，代表着东汉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他们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政治实践者、士大夫精神的缔造者，他们在汉末士大夫救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不可置疑。应当指出，中州党人这种核心和领袖地位的形成，与中州地区敦厚的文化底蕴和政治中心地位密切相关；东汉党人救世运动的失败，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悲剧。

我们在肯定东汉士大夫、尤其是党人救世运动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在被纳入专制皇权的政治体系后，东汉士大夫丧失了独立人格，先秦儒家“天下为公”、“道尊于势”的文化传统不复存在，形成了忠于一姓的政治意识；在纷纭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部分士大夫表现出贪浊腐败、附趋恶势力、惜身逃避的一面；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着长于议论、疏于政务、缺乏治世实际才能和政治斗争经验等缺失。这些缺失的存在，是由专制皇权的进一步强化、政治化的儒学的禁锢、经济和宗族的羁绊等因素造成的。本书最后一章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以期对东汉士大夫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士大夫精神发微	(1)
第一节 贵族等级制的解体 and 士阶层的形成	(2)
一 社会大变革与“士”的分化	(2)
二 士阶层的扩大及其分野	(5)
第二节 士大夫精神的源头	(14)
一 士的文化传统	(15)
二 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和士精神	(20)
第二章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	(37)
第一节 汉初士人的处境和政治追求	(38)
一 士人的重新活跃	(38)
二 陆贾、贾谊等人对秦政的批判和对汉政的设计	(39)
三 汉初儒生的参政努力	(45)
第二节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	(47)
一 独尊儒术——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	(47)
二 董仲舒的新儒学对皇权的附会和制衡思想	(50)
三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和士大夫标准的政治化	(53)
第三节 “霸王道杂之”政治环境下的士大夫阶层	(57)
一 “霸王道杂之”治国方针的确立	(57)



二 儒生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人生理想	(58)
三 专制皇权对士大夫的压力	(60)
四 西汉中后期的士风	(61)
五 士大夫与王莽新政	(64)
第三章 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67)
第一节 东汉前期的崇儒——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67)
一 东汉初年的尚儒之风	(67)
二 儒学社会化的深化	(69)
三 士大夫与皇权政治的进一步结合	(72)
第二节 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75)
一 儒生与文吏的冲突与交融	(75)
二 士大夫队伍的壮大及社会影响力的扩大	(81)
三 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对“道”的持守	(85)
四 士大夫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90)
第三节 政治的崩坏和士大夫的政治拯救	(92)
一 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与专制皇权的矛盾	(92)
二 外戚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	(96)
三 士大夫政治集团的忧患意识和政治拯救	(100)
第四章 党锢之祸——士大夫的救世悲歌	(118)
第一节 三大政治集团的矛盾与冲突	(118)
一 三大政治集团概述	(118)
二 外戚宦官专权对士大夫权益的侵蚀	(125)
三 累世经学和门生故吏	(130)
四 清议之风的兴起	(133)
第二节 党锢之祸——士大夫的救世悲剧	(135)
一 士大夫的交友之道	(135)
二 太学生的干政之举	(139)

三 “党议”之兴和第一次党锢之祸	(148)
四 士大夫的救世悲剧——第二次党锢之祸	(152)
第五章 中州党人在救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158)
第一节 中州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158)
一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社会经济	(159)
二 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中心地位	(166)
第二节 中州党人在救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174)
一 东汉前中期的中州士大夫	(174)
二 清议中的中州士人	(179)
三 中州“党人”在救世运动中的地位	(182)
第六章 士大夫精神的奠基	(194)
第一节 修己安人、轨德立化的道德操守	(194)
一 士大夫修己安人的道德实践	(195)
二 士大夫的轨德立化	(207)
第二节 刚健有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20)
一 先秦西汉士人的忧患意识	(221)
二 以天下为己任——东汉党人的处世态度	(229)
第三节 舍生取义、趋死不避的殉道精神	(237)
一 儒家的气节观及党锢前士大夫的实践	(237)
二 “党人”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	(241)
第七章 东汉士大夫的缺失	(245)
第一节 “士道”的局部遗失	(245)
一 由“天下为公”到“愚忠”——独立人格的丧失	(246)
二 个人道德的局部缺损	(255)
三 对恶势力的附趋和对颓政的漠视	(259)



第二节 士大夫政治才能的缺乏	(263)
一 治世实际才能的缺乏	(263)
二 政治斗争经验的缺乏	(265)
第三节 东汉士大夫的缺失形成之因	(272)
一 专制皇权强化的影响	(272)
二 儒学对士大夫的思想禁锢	(278)
三 制度的弊端	(282)
四 经济和宗族的羁绊	(287)
 主要征引书目	 (291)
 后 记	 (294)



第一章 士大夫精神发微

“士大夫”一词，初意为西周贵族等级阶梯中的“士”和“大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其涵义扩大，除指称特定的阶层外，有了特指“通古今，辩然否”、读书知礼、通权达变的知识阶层之意。秦汉以后，失去了最初之意，一般泛指研习儒学而做官的官吏及在野的知识阶层。这里所讨论的“士大夫”及其精神，为秦汉以后之概念。秦汉以后的士大夫，是儒学与大一统专制皇权、儒生与封建官僚政治相结合而孕育的社会阶层。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深深钳上了士大夫的烙印。士大夫的政治和文化行为，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主线之一。学界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形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西汉中后期，东汉时期，士大夫政治形成，士大夫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开始发挥主体作用。在东汉外戚宦官专权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东汉士大夫，尤其是东汉“党人”继承、发展和实践了先秦儒家的文化传统，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铸就了以“天下为己任”为核心的士大夫精神，经历代士大夫传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和知识分子的可贵性格。东汉“党人”所铸就的士大夫精神，发微于先秦时期的士精神。探讨东汉所形成的士大夫精神，有必要对先秦士阶层和士精神的形成做以简单梳理。



第一节 贵族等级制的解体 and 士阶层的形成

“士”在西周时期是贵族等级中卿大夫之下的一个阶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革使贵族等级秩序及与之相应的礼乐制度和分封采邑制遭到严重的破坏。作为贵族最低一级的士，在剧烈的社会巨变中，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职事和土地，成了无根的游士，进入了一种无定主的状态。但他们拥有礼乐文化传统。在旧秩序破坏、新的社会秩序未完全确立的形势下，他们凭藉知识上的优势奔走游说，或致力于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或投附于新生贵族，寻求新的职事。而贵族的衰落和庶人地位的上升，则使士的人数随之大增。于是一个熟知礼乐文化、卓然独立的文士阶层形成了。

一 社会大变革与“士”的分化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周室东迁之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①的时代一去不返，维系政治秩序的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室衰微，诸侯国之间大吞小、强凌弱的兼并战争打破了以亲亲原则为基础的分封制，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四《列国疆域表》考，春秋时期，鲁兼有九国之地，齐并十国之地，晋灭十八国，楚吞四十二国，秦晋互伐者十八，晋楚大战者三，吴楚相攻者二十三，吴越相攻者八，齐鲁相攻者三十四，宋郑交兵者凡三十九。与此同时，诸侯国内部的政治

^① 《论语·季氏》。

^②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秩序也遭到严重破坏，政权逐渐下移。据学者统计，孔子《春秋》书诸侯杀大夫者四十七，书放大夫者二，书卿大夫公子出奔者五十七，^①至于卿大夫自相残杀者不可胜计。“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②《左传·昭公三年》载晋叔向谓齐晏子曰：晋、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八姓子弟“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晋公族尽矣，胥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胥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而已”。可见，以宗法制为主体的政治秩序至春秋已经瓦解，不少贵族的子孙降为士。

士处于卿大夫与庶人之间，是贵族阶层中的最低层。《孟子·万章下》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礼记·王制》亦曰：“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者所言大体相同。就其食禄来说，“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③《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大夫师服之语：“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亲，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为等衰”，杜预注曰：“士卑，自以其子弟为仆隶也”。《国语·晋语四》则进一步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但是，随着政治的频繁巨变和兼并战争的进行，贵族内部的等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一些卿大夫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丧失了原来的政治经济地位，沦落为士；部分士则丢失了原有的职事和土地，只剩下文化技能，而一些庶人则由于各种因素上升为士，士阶层的成份变得日益复杂。

《礼记》对士的演变过程有以下表述：“问士之子长幼，长则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13。

② 《国语·周语下》。

③ 《孟子·万章下》。

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少仪》）。“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问庶人之子，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曲礼》）。许慎《说文解字》释士曰：“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刘向《说苑·修文》曰：“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白虎通·爵》亦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三《释士》引吴承仕对“士”的界定：“士，古以称男子，事为耕作也”，认为士的原始义为农夫。而顾颉刚先生则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的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歿，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寢假而羞言戎兵，寢假而惟尚外表……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为之儒，武者为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之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①

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士的演变轨迹：士最初为氏族内成年男子之称；进入阶级社会后，为统治阶级中的低级贵族，此时文、武不分，且尚未与农耕相脱离，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遇战则充当武士，因此时尚无常备军，故战争结束则归田督子弟农耕。^② 因其熟知礼、乐、书、数，故而部分士或受命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第85-91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 据赵世超先生研究，西周无常备军制，战士皆临时征调。请参阅赵先生《西六师、成周八师不是常备军》一文。见《瓦缶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居官，从事具体事务的管理，或充当高级贵族的家臣，主持婚、丧、嫁、娶、祭祀等事务。所谓“士，事也”之“事”，概指农耕、充当武士和为官府或高级贵族担当文化、教育活动等；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士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和赖以生存的职事，并从宗法制度下解放了出来，一部分士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仍以“武”为职事，或向侠的方向演进，而另一部分士则以“通古今，辨然否”、掌握礼乐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向纯文士的方向发展。这样，原来的士阶层发生了重大分化，“古之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士有了特定的涵义，开始专指以文谋生、以道干君的知识阶层了。迄于战国，这一演变基本完成，并在新的士阶层内部产生了新一轮的分化。

二 士阶层的扩大及其分野

新生的代表知识阶层的士一经产生，便在纷繁复杂的时代发挥着巨大功用。“当士演变成参与政治预备军的时候，也正是贵族阶层已经腐烂，需要依赖士的能力以维持其统治的时候。于是士势必起而追求政治上的各种知识，这使士开始过渡到‘古代知识分子’的性格。更因春秋中叶以后，大批贵族的没落，把贵族手上所保持的知识，解放向社会，所以孔子便能以远古贵族手上的诗书礼乐来作为教育他学生的教材，这更助长了社会上以政治知识为专业的士的成长”。^①也就是说，时代需要新生的士充当新的社会角色，学习和掌握政治知识。社会的需要扩大了士的队伍，并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

春秋时期的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与贵族阶层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还兼有武士之风。老子、孔子均为贵族出身，孔子弟子中亦多为贵族后裔，这决定了此时士的政治思想的保守性。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第5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弟子冉求、樊迟曾参与是年齐、鲁之战：齐人伐鲁，“孟孺子继帅右师……冉求率左师……樊迟为右”。孔子另一弟子子路以勇闻而进。这些情况说明，虽然孔子主张“士志于道”，但事实上此时之士尚非纯粹的文士，也未彻底摆脱身份的束缚。因此，孔子一生努力将新的士集团转变为人类命运的担当者、“道”的传播者，并着重于塑造士的独立人格。

学与仕是新生之士的突出的特征。所谓学，即学习礼乐文化知识和行政技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①“学而优”是“仕”的前提条件。孔子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②“学，禄在其中矣”。^③既强调学为基础，又强调守道不移。《吕氏春秋·尊师》曰：“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狙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此以学化性之例。《论语·为政》又载孔子弟子子张“学干禄”，孔子教之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也”。“学而优则仕”反映了当时之士求知见用的追求。学有所成，步入仕途，以道及礼乐辅佐君主，兼善天下，乃是新生之士的共同愿望。孔子是主张入仕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④“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⑤“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⑥只不过以君主

① 《论语·子张》。

② 《论语·泰伯》。

③ 《论语·卫灵公》。

④ 《论语·述而》。

⑤ 《论语·泰伯》。

⑥ 《论语·卫灵公》。

有道、无道作为先决条件。孔子游于卫，卫灵公不用，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①可见孔子入仕愿望之切。强烈的入仕参政意识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或者说，孔子时代，士人就形成了“恋政情结”。孔子一生奔走于诸侯之间，欲寻觅有道之君而辅之，以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正是这种“恋政情结”的反映。

如前所述，社会的动荡、宗法制的破坏、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和贵族土地制度的瓦解，催生出了以文化为特征的新生之“士”。但据史学界的研究，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并在社会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士阶层的最终形成，是在春秋战国之交。封建制度的确立，使士阶层彻底摆脱了旧秩序的羁绊。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使各诸侯国君不可能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相反，为使其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他们需要士人为自己提供智力支持。因此，厚招游学、招贤纳士成为诸侯国君重要的政治举措。战国早期，魏文侯以礼贤首霸中原。《史记·魏世家》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委李悝以政，民富国强；任吴起为将，取秦西河之地。齐国稷下学宫集天下学士数百千人：“（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与之略同：“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驺髡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盐铁论·论儒》亦云：“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

① 《史记》卷47《孔子世家》。

② 《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